

# 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

## ——兼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孙炜红 张俊良

**【内容摘要】**文章基于中国台湾 1970 ~ 2014 年的人口数据,运用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法,测算台湾地区婚姻挤压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70 ~ 2014 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 MR 值逐年增大,同时理论男婴富余比呈小幅度上升的走势,表明未来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也呈上升趋势。中国台湾与大陆的比较分析表明,1987 ~ 2013 年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小于大陆值,但婚配性别比 MR 值高于大陆值。文章利用台湾地区和大陆历年的出生性别比,检验宏观人口因素对未来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影响,发现婚姻匹配是个体主观偏好和客观婚姻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婚姻挤压的前置因素,个体的家庭与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工作情况等社会资本才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台湾人口;理论男婴富余比;婚配性别比;婚姻挤压

**【作者简介】**孙炜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博士生;张俊良,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611130

## Marriage Squeeze in Taiwan: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Mainland

Sun Weihong Zhang Junl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rends in the marriage squeeze in Taiwan using the theoretical redundant ratio of male births and sex ratio at marriage (MR) with Taiwan's population data from 1970 to 2014. MR in Taiwan kept increasing and the theoretical redundant ratio of male births had a modest rise from 1970 to 2014, implying that Taiwan's male marriage squeeze would be also on the rise in the fu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heoretical redundant ratio of male births in Taiwan was lower, but the MR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ainland from 1987 to 2013.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marriage match is a result of both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e preferences and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of the marriage market structure. Macro structure of sex and age are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affecting marriage squeeze, whil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marriage squeeze are family backgrou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economic and job conditions.

**Keywords:** Taiwan's Population, Theoretical Redundant Ratio of Male Births, Sex Ratio at Marriage, Marriage Squeeze

**Authors:** Sun Weihong is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Email: swh50236@163.com. Zhang Junliang is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1 引言

婚姻挤压是婚姻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具有时代性特征。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约有109万人从大陆迁台,迁入人口的性别比高达368,打破了台湾地区原有人口性别比的均衡状态,导致1955年台湾的婚配性别比高达138.62,男性婚姻挤压严重(《人口研究》编辑部,2003)。严重的婚姻挤压滋生了性犯罪与色情服务业泛滥等社会问题,也引起诸如童养媳、买卖婚姻、骗婚等伦理问题以及一系列的生殖健康问题等。受中国传统阶层内婚制,如“门当户对”与“男高女低”的择偶要求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要素的影响,女性择偶多倾向于同质或向上婚的婚配模式,从而造成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男性或者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形成婚姻挤压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起,台湾地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男性陆续出现婚配难题,不得不引入外来新娘(大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地区,以及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来缓解婚姻挤压的状况(于宗先、王金利,2009)。

根据台湾地区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4年底台湾地区的外来新娘累计高达44.20万人,较之1998年的2.06万人,增加了42.1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1.12%;其中,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新娘由1998年的0.87万人累计增长到2014年的17.08万人,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新娘占外来新娘总人口数的比值从1998年的42.23%下降到了2014年的35.39%,而大陆及港澳地区的外来新娘占外来新娘总人口数的比值由1998年的57.77%上升到2014年的64.61%,上升了6.84个百分点。台湾的外来新娘规模数不断扩大,是否反映出台湾婚姻市场中青年男女婚娶难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在台湾外来新娘人口数不断增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带来婚姻市场结构的失衡?还是出生人口数的变化和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引起婚姻挤压度增加呢?

早期的婚姻研究多把婚姻市场视为择偶过程中的一种结构性限制,但在1980年代后开始探讨婚姻市场的变化对青年男女择偶偏好的影响。台湾学者通常利用婚友网站中男女填写的个人资料以及择偶条件,研究适婚人口的择偶年龄偏好、学历偏好、择偶时期望伴侣的年龄、身高和学历等上下限范围即上下门槛效应以及择偶困境等相关议题,研究发现,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婚龄人口会放宽选择配偶的条件进行婚配(张荣富,2006;巫丽学、蔡瑞明,2006;张荣富、唐玉婵,2009a;张荣富,2010;张荣富、蔡滋纹,2014等)。虽然婚友网站上的个体资料大多是自愿填写的,但利用婚友网站上的数据进行分析也有诸多不足:第一,资料反映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数据的信度难以检验;第二,资料的内容也有人口结构的差异,婚友网站中涉及的人群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人口年龄范围,且使用婚友网站的人群也有特质性;第三,在婚友网上搜集的微观数据,数据质量难以确保,相应的研究结果可信度也不易衡量。宏观上,学者大多集中探究我国大陆婚姻挤压的影响因素、引发的后果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郭志刚、邓国胜,2000;陈友华,2004;孙炜红、谭远发,2015;等),对台湾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学者结合台湾一些年份的数据,探究适婚人口的性别比偏高,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的现象(刘爽,2000;石人炳,2002)。同时,运用婚姻挤压的不同测算方法,对过去婚姻挤压水平进行描述;基于台湾地区1980年、1990年、1995年以及2000年的人口数据,测算婚姻挤压指数、婚姻寿命指数以及初婚挤压指数,表明在1980年前表现为女性婚姻挤压,而1980年后转变为男性婚姻挤压现象(杨文山,2005)。但是,宏观上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缺乏用年度数据真实反映台湾地区过去、现在婚姻挤压的水平以及变化趋势;第二,在婚姻挤压测算方法的选取上,上述3种方法的计算都较为复杂,同时,对婚姻市场供需情况的敏感度不高。

本文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于数据的可获性和测量方法的可行性,立足于人口学的视角,运用改进后的婚配性别比法,探究台湾地区是否存在婚姻挤压、婚姻挤压的水平以及结合大陆人口数

据进行比较分析,检验出生性别比宏观的人口因素是否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首先,严格参照台湾地区有关法律规定和大陆《婚姻法》中最低法定婚龄的限定,来选取历年适婚的人口数据。其次,在测量方法上,选用队列和时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已有的研究中少有分析队列效应因素对人口婚配的影响,因此先利用理论男婴富余比法预测不同出生队列男婴在未来婚姻市场中挤压的情况。同时,为提高测算方法的可行性,采用孙炜红等修正后的婚配性别比法,将未达到最低法定结婚年龄人口的占比进行重新赋值,以测算婚姻挤压水平。婚配性别比法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指标,测算也相对简单。最后,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比较 1987~2013 年间台湾地区与大陆的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反映我国整体的婚姻挤压水平以及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趋势,并得出相应的启示,以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

## 2 研究数据与婚姻挤压的测度方法

###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第一,1947~2014 年台湾地区各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据、出生率以及出生性别比等数据均来自台湾地区历年人口统计资料,1970~2014 年分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来自于台湾家扶智库儿童暨家庭福利实物研究平台数据库中关于台湾地区历年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数据;第二,大陆 1987~1995 年与 1996~2013 年分性别各年龄组的人口数据,分别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1988~1996 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7~2014 年);第三,大陆的出生率、总人口规模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第四,大陆的出生性别比数据,1950~1959 年的数据源于李伯华、段纪宪(1986)《对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估计》的汇总,1960~1989 年的数据源于顾宝昌、许毅(1994)的《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1990~2013 年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第五,由于我国宏观的婴儿死亡率数据质量不高,为降低数据质量问题带来的系统误差,选用以下学者校正后的婴儿死亡率。大陆 1987 年分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数据来自于《人口研究》编辑部(2003)的《透视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1989 年与 2000 年分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数据来自于曹萌、雷鹏、吴擢春(2013)的《中国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地域差异》,2010 年分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数据来源于王金营、戈艳霞(2013)的《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

### 2.2 婚姻挤压的测度方法

不同的婚姻挤压测算方法其优缺点各有差异。其中,男性婚配富余比法能较好的测度男性婚姻挤压,但该方法未考虑队列效应,即出生队列、时间量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婚配性别比法的优点是涵盖了男女婚龄差并且是一个综合指标。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测算婚姻挤压程度。第一,结合男性婚配富余比法,测算某出生队列的理论男婴富余比,从队列的角度反映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趋势,提升预测结果的规律性和稳定性(李婷、张闫龙;2014);第二,采用孙炜红等改进后的婚配性别比法,以测量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水平。

#### 2.2.1 某出生队列理论男婴富余比

男性婚配富余比法,能较好的反映无法找到配偶的男性占比。因此,本文从每年的富余男婴进行队列分析,在不考虑未来各个阶段男性的死亡情况下,预测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水平。出生队列理论男婴富余比是指某一年出生的男婴与女婴数量之差与该出生队列中男婴人数的比值。此外,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如:台湾地区 1970 年的婴儿死亡率为 16.85‰;其中,男婴的死亡率为 18.15‰,女婴的死亡率为 15.55‰,因此,剔除婴儿死亡率对婴儿人口规模的影响,以降低该方法的测算误差;同时,由于大陆各年间分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数据无法获得,为增加可操作性,1987~1989 年分性别婴儿死亡率,采用李树茁等学者对这 3 年修正后的数据,并假定 1990~1999 年分性别婴儿死亡

率遵循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简称为“四普”)修正后的数据 2000~2009 年分性别婴儿死亡率遵循 2000 年“五普”修正后的数据 2010~2013 年的分性别婴儿死亡率遵循 2010 年“六普”修正后的数据。即某出生队列理论男婴富余比的计算方法如下:

$$\begin{aligned} \text{某出生队列中理论男婴富余比} = & \\ & \frac{(\text{某年出生的男婴人口数} - \text{男婴死亡人口数}) - (\text{同年出生的女婴人口数} - \text{女婴死亡人口数})}{\text{某年出生的男婴人口数} - \text{男婴死亡人口数}} \\ & \times 100\% \end{aligned}$$

### 2.2.2 婚配性别比值的测算

婚配性别比法是根据理想夫妇的年龄差(-1 至 4 岁)衡量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女性人口数之比(郭志刚、邓国胜 2000)。文献研究发现台湾的婚龄差,通常是男比女大 2~4 岁(杨文山 2005),同时张荣富、唐玉婵(2009b)利用 2005 年台湾地区的人口统计资料,分年龄组探讨夫妇婚龄差(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发现年龄同质婚仍占多数,其中婚龄差在 0~5 岁的夫妇占比最高为 58%,且女大男小达 13.7%。鉴于此,本文结合台湾地区 1970~2014 年和大陆 1987~2013 年的青年男女人口数据,运用改进后的婚配性别比法(孙炜红、谭远发 2015)<sup>①</sup>,测算历年大陆与台湾地区初婚市场的婚配性别比,即“Sex Ratio at Marriage”(以下用“MR”表示),反映两地的婚姻挤压水平以及变化趋势。

由于台湾地区有关法律规定,男未滿十八岁,女未滿十六岁者,不得结婚;未成年人结婚(<20 岁为未成年人),应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同时,台湾地区的数据表明,台湾 15~19 岁年龄组中有配偶的人口占比较高,尤其是在 1970、1980 年代,直到 1999 年该年龄段结婚的占比才低于 1%,并逐步降到 2014 年的 0.24%,因此,不能忽视未成年人结婚的情况。

婚配性别比值反映婚姻市场中婚姻挤压的水平。其中,婚配性别比 MR 的临界值为 100。高于 100 表现为男性婚姻挤压,以 10 为分界区间,当  $100 < MR < 110$ 、 $110 < MR < 120$  和  $MR > 120$  时,分别表现为轻度男性婚姻挤压、中度男性婚姻挤压与高度男性婚姻挤压;而低于 100 呈现出女性婚姻挤压的现象,同理  $90 < MR < 100$ 、 $80 < MR < 90$  与  $MR < 80$  分别为轻度女性婚姻挤压、中度女性婚姻挤压和高度女性婚姻挤压。一般而言,轻度和中度婚姻挤压对终身不婚人口的影响有限,但对适婚人口的初婚年龄、婚龄差以及婚姻稳定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高度婚姻挤压水平将带来终身不婚人口的绝对数增加,引发终身未婚者未来由谁养老、如何养老等现实问题,这可能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是否理论男婴富余比越高反映未来婚姻挤压的程度就越大,对应的婚配性别比值就越大呢?笔者将通过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 3 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水平的实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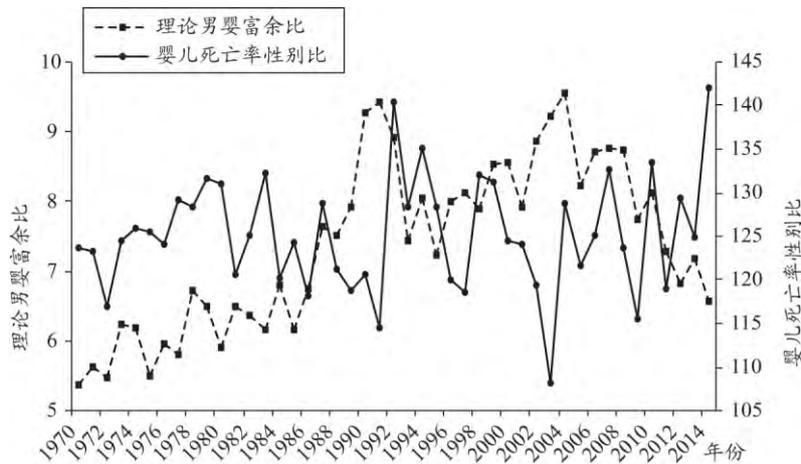
### 3.1 1970~2014 年队列中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婴儿死亡率性别比都呈现锯齿状的变化趋势

利用台湾地区公布的分性别出生人口规模数与台湾家扶智库数据库中统计的历年婴儿死亡率等相关人口统计资料,测算台湾地区在 1970~2014 年各个不同出生队列中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如图 1 所示:

<sup>①</sup> 若完全按照理想夫妇年龄差的模式,使得男性和女性在某些年龄别的测算中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的数值不能完全满足以上 6 个差级,相应的 6 个占比之和不等于 1。鉴于此,重新对年龄别夫妇婚龄差的占比进行加权赋值,得到新的占比并继续后面的计算。

图1 台湾地区1970~2014年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理论男婴富余比

Figure1 Infant Mortality Ratio and Theoretical Redundant Ratio of Male Births in Taiwan from 1970 to 2014



资料来源:1970~2014年婴儿死亡率的数据源于台湾家扶智库儿童暨家庭福利  
 实物研究平台数据库中关于台湾地区历年婴儿死亡率的统计。

正常情况下,女婴死亡率低于男婴,婴儿死亡率的男女性别比为1.2~1.3(若乘以系数100,则为120~130)(李树茁,2013;曹萌、雷鹏等,2013),若观测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低于正常值,说明女婴死亡水平偏高(李树茁、韦艳、姜全保,2006);由于各地信仰的生育文化不同,例如:东亚、南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拥有强烈的男孩偏好和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往往造成(相对于男婴)偏高的女婴死亡率(李树茁等,1996)。从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婴儿死亡率性别比都处于120~130正常值之间,仅1972、1986、1989等10个年份小于120,呈现女婴死亡水平偏高的现象。同时,1991年与2003年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是1984~2007年两个年轮中最低的。这可能与生育文化相关,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有较强的生肖偏好与回避观念,扎堆在吉年生育而回避在不吉利的年份生育。生肖论命的观念认为吉年(如龙年)出生的孩子命更好,将有更多的成就。Goodkind(1991)的研究显示,在农历生肖龙年1976年和1988年,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较之兔年出现了激增;而日本和韩国等民间信仰认为属马是不吉利的,尤其是生育女孩。1966年的农历火马年,日本的生育率下降了25%左右(Rohlf, Reed and Yamada, 2010)。同时,中国的民间盛传“羊年不宜生子”、“十羊九不全”等“羊命论”,1991年与2003年都是羊年,这两年间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偏低,可能是人为选择回避在该年生育女孩或者父母对男婴的健康比较关注,忽视女婴的健康,从而导致女婴的死亡率较高。

由于理论男婴富余比是通过不同性别的出生人口数和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进行换算得出。通过图1可知,台湾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理论男婴富余比的变化走势相同,都呈现不同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同时,分析台湾各个出生队列中理论男婴的富余比,发现从1970年的5.35%逐步上升到2004年的最大值9.56%,接着下降到2014年的6.57%,但这45年间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都小于10%,说明尽管未来台湾地区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婚姻挤压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理论上男婴富余的规模数不是很大。因择偶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男女婚配不只是受婚姻市场宏观结构如婚龄期男女人口比例改变的影响,还受个体的异质性与主观择偶偏好影响(张荣富、唐玉婵,2009a);且随着社会变迁婚龄期男女的择偶标准也不断升高,不仅限于过去的身高、年龄以及有无婚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李银河,1989),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整个婚姻市场中的挤压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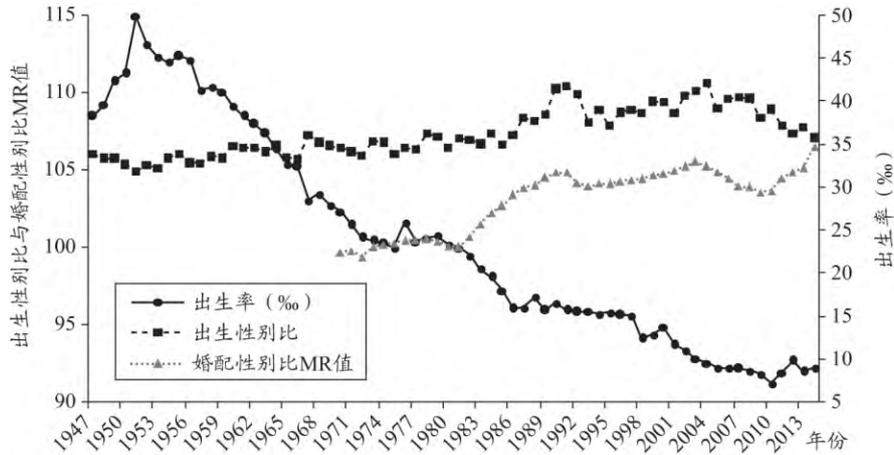
### 3.2 1970~2014年的婚配性别比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根据台湾地区的人口数据,测算出台湾地区1970~2014年婚配性别比MR值以及台湾地区

1947 ~ 2014 年的出生性别比与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图 2 台湾地区 1970 ~ 2014 年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与 1947 ~ 2014 年出生性别比和出生率的变化趋势

Figure 2 Trends in Sex Ratio at Marriage in Taiwan from 1970 to 2014, and Sex Ratio at Birth and Birth Rate in Taiwan from 1947 to 2014



资料来源: (1) 1947 ~ 2014 年出生性别比和出生率的数据来源于台湾地区公布的历年出生数和粗出生率;

(2) 测算 1970 ~ 2014 年婚配性别比的数据源于台湾地区历年分性别及单一年龄的年底人口数。

从图 2 可以看出,台湾地区 1970 ~ 2014 年的婚配性别比逐年上升,MR 值从 1970 年的 99.70 上升到 2014 年的极值 106.52,但上升幅度不大,45 年来上升了 6.84%。总体上,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呈上升的趋势,由轻度的女性婚姻挤压转变为轻度的男性婚姻挤压,这与杨文山(2005)的研究结论相似。

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 MR 值的变化走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0 ~ 1982 年,台湾地区的 MR 值在 100(平衡点)周围波动,变化区间较小为  $-0.64 \sim 0.71$ ,表现由轻微的女性婚姻挤压逐步变为轻微的男性婚姻挤压。而婚姻市场不可能呈现出绝对的婚配平衡或达到完全婚配的情况,可以粗略的认为台湾 1970 ~ 1982 年间婚姻市场中婚龄期男女处于正常的择偶范围;同时,根据台湾地区历年“统计年鉴”中有关现住人口的婚姻状况资料显示,1975 ~ 1982 年台湾女性未婚人口比例随年龄组的升高而降低,且 45 ~ 49 岁组及以上的女性,曾婚的比例都大于 97%。依照国际标准,视 50 岁未婚为终身不婚,说明台湾女性终身不婚比例很低,绝大多数女性都曾婚(《人口研究》编辑部 2003)。因此认为这期间台湾婚姻市场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第二阶段,1983 ~ 2014 年间,台湾的婚配性别比 MR 值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MR 值由 1983 年的 101.51 逐步上升到 2014 年的最大值 106.52,32 年内的婚配性别比值都在 100 ~ 110 之间波动,表现出轻度的男性婚姻挤压。这可能是受以下因素影响:(1) 台湾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与出生率变化趋势不同(见图 2)。随着台湾地区出生率的逐年降低,出生性别比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受儒家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台湾家庭计划的实施,引发男孩的偏好与生育数量矛盾的激化;(2) 很多夫妇怀孕后选用羊水试验来鉴定胎儿的性别,人为确保生育男孩(Freedman et al.,1994)。从 1967 年开始台湾地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超过“国际警戒线”(103 ~ 107)为 107.26 后,逐步变化到 1998 年的 108.73,直至 2014 年的 107.14。

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的范围,将引起未来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青年男女的比例失衡,造成婚姻挤压的后果(《人口研究》编辑部 2003),且伴随出生率的降低,带来某一出生队列的男女在未来婚姻市场中婚配规模数减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前一个或几个出生队列中男性择偶的困境。1967 ~ 1998 年出生率的下降与出生性别比小范围的偏倚可能引发了 1983 ~ 2014 年间婚姻市场中男性出现

婚娶难的问题;其次,台湾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导致人口输出地婚姻市场的失衡。适婚女性流动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增加了流入地适婚男女的择偶范围;相反,加剧了农村贫困地区男性结婚的困境(Zhang 2009; Gupta et al. 2013)。同时,由于对教育的重视,国民教育的普遍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不相上下。截止2014年底,女性就读研究所与大学的占比分别为4.67%和36.03%,较之1997年分别增长了4.29与22.76个百分点。教育的均等化,女性为追求高水平的知识诉求,延迟婚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婚龄期男女的性别结构失衡,强化了婚姻挤压。最后,随着外来新娘的引入,为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未婚男性尤其以农、渔、工为职业的男性,提供了结婚机会(于宗先、王金利 2009)。中国台湾与东南亚各国的跨国联姻,始于1979年末与1980年初,台湾地区推行的南向经济发展政策,提高了台商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业务往来,增加了东南亚地区外来新娘的涌入(于宗先、王金利 2009)。因此,外来新娘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台湾地区婚姻市场挤压的程度,缓解了男性婚姻挤压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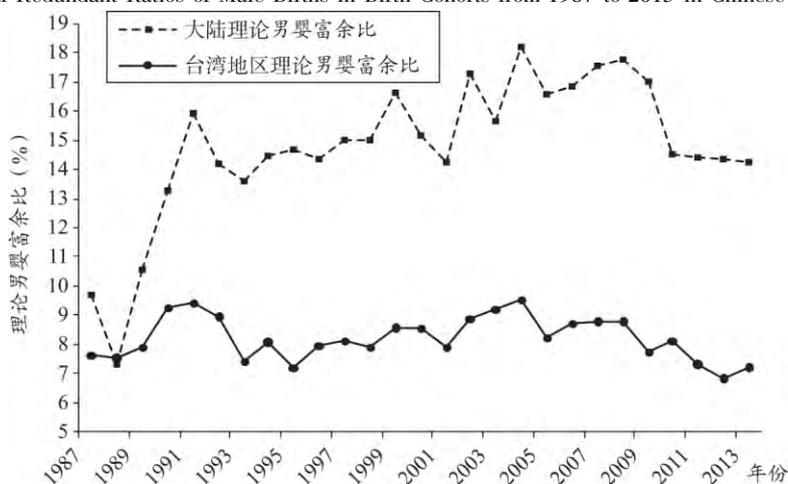
#### 4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婚姻挤压情况的比较分析

##### 4.1 1987~2013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出生队列中的理论男婴富余比

基于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可获得性,运用大陆与台湾地区1987~2013年的宏观数据,测算不同出生队列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并探讨其变化趋势,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1987~2013年出生队列中理论男婴富余比

Figure 3 Theoretical Redundant Ratios of Male Births in Birth Cohorts from 1987 to 2013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资料来源: (1) 中国大陆1987~2013年的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出生性别比数据见前面第二部分中数据来源的介绍; (2) 台湾地区1987~2013年出生率、出生性别比分别来自于台湾公布的历年粗出生率和出生数,1987~2013年婴儿死亡率的数据来源于台湾家扶智库儿童暨家庭福利实物研究平台数据库中关于台湾地区历年婴儿死亡率的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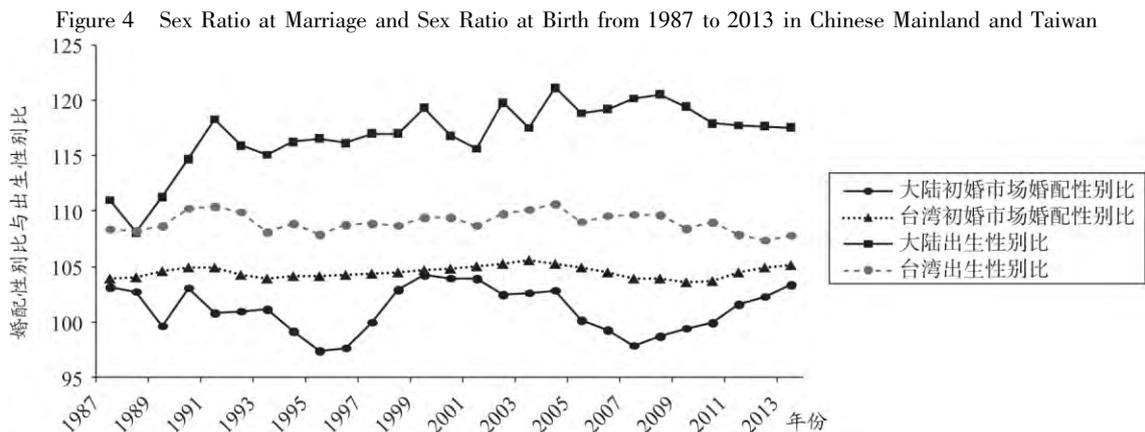
图3呈现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各个出生队列中理论男婴富余比的情况,可以有以下发现:第一,1987~2013年各个出生队列中大陆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几乎都高于台湾地区(除1988年以外)。第二,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这27个出生队列中的理论男婴富余比都呈现“波浪状”的变化趋势,并且大陆的变化趋势更明显,从1987年的9.72%逐步变化到2013年的14.27%,上升幅度高达46.81%,说明未来大陆男性婚姻挤压度将逐步升高。而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都小于10%,最大值为2004年的9.56%;与此同时,对于大陆的理论男婴富余比而言,其最大值对应的年份也是2004年,为18.18%,表明无论是中国台湾还是大陆,理论男婴富余比最大值对应年份大体一致。第三,理论男婴富余比是预测未来婚姻市场中该出生队列男性人口婚姻挤压的情况。根据台湾地区的有关法律规定

以及结合台湾地区的实际婚配情况,本文依照郭志刚、邓国胜(2000)提出的婚配性别比法以及韦艳、董硕等(2013)对初婚峰值年龄的估算将台湾男性18~36岁与女性16~34岁青年人口纳入初婚市场,进行婚配,同时将大陆男性22~36岁与女性20~34岁的人口,作为初婚市场中可供选择的适婚青年进行探讨。理论上台湾地区1987~1995年男婴富余比能反映2005~2013年台湾初婚市场中MR值的变化趋势,大陆1987~1991年的男婴富余比能反映在2009~2013年间的婚姻挤压程度,接着进行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水平的比较。

#### 4.2 1987~2013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变化幅度较小且平稳发展,而大陆的MR值呈现升降不一的趋势

结合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历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得出1987~2013年大陆与台湾婚姻市场中的婚配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

图4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1987~2013年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1) 测算大陆婚配性别比1987~1995年的人口数据源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96~2013的数据源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 台湾的数据来源于台湾地区历年分性别及单一年龄的年底人口数。

从图4中可以发现,第一,台湾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值都高于大陆的MR值。1987~2013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MR值变化区间为103.56~105.55,对应大陆的婚配性别比MR值的波动范围是97.34~104.20,比较两地的婚配性别比MR值,发现台湾都高于大陆,但大陆的波动范围大于台湾地区。然而图3显示,中国大陆的理论男婴富余比高于台湾,按照理论男婴富余比的结果,大陆的婚配性别比MR值应该高于台湾。因为出生性别比是影响理论男婴富余比的主要因素,从图4中1987~2013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看,大陆仅在1988年低于台湾地区,其他年份都高于台湾地区,则在出生性别比和分性别婴儿死亡率的作用下,测算出大陆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将高于台湾。与此同时,因台湾婚龄期的人口规模数较少,婚姻市场中一旦出现婚配失衡的现象,表现出的婚姻挤压程度就相对更为明显;第二,大陆与台湾的婚配性别比都呈现不同的变化走势,1987~2013年台湾地区都表现出轻度的男性婚姻挤压,而大陆既有轻度的男性婚姻挤压也有轻度的女性婚姻挤压。第三,由于外来新娘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台湾地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男性的婚姻挤压水平。

从大陆婚配性别比MR值上看,1987~2013年婚姻挤压度呈波浪状的变化趋势。尽管MR值从1987年的103.08逐步变化到2013年的103.35,上升趋势不大,仅上升了0.26个百分点,表现出既有轻度女性婚姻挤压也有轻度男性婚姻挤压的情况,但1987~2013年间波动的区间略大,MR值在97.34~104.20之间波动。这与郑维东、任强(1997)的研究结果相似,大陆婚姻挤压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前女性婚姻挤压逐步转变为男性婚姻挤压,但转变后的男性挤压度仍徘徊在低水平。

#### 4.3 个体禀赋差异和经济水平等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中国台湾与大陆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结合两地的数据,检验单一的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的范围,及对未来婚姻市场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大陆与台湾地区1949~2014年出生性别比发现,台湾的出生性别比在104.90~110.66之间波动,仅在1953年、1967~1974年、1978~1979年以及1988年高于大陆的出生性别比,而大陆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突变的现象。那么,按照很多学者的观点(李南,1995;潘金洪,2007;《人口研究》编辑部,2003等),台湾地区可能在1983~1987年、1989~1990年、1994~1995年以及2004年的婚配性别比MR值高于大陆。但结果并非如此,台湾地区1987~2013年的MR值都高于大陆。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婚姻市场中适婚男女的婚配是受个体主观偏好和客观婚姻市场结构二者共同作用。这又恰好与相关学者提出的宏观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夫妇婚龄差是影响未来婚姻市场变化的内在动力有所不同(Goodkind,2006;Guilmoto,2012;郭志刚、邓国胜,1998;牛艳军、韩静,2009;姜全保、李晓敏等,2013;李树苗,2013)。此外,台湾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大陆,经济与信息的开放发展逐步打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婚配地域的壁垒,提高了择偶范围和通婚圈;相反,也加剧了家庭经济背景较差、父辈资源较少等个体的婚姻挤压。因此,本文认为宏观的性别、年龄结构和婚龄差是影响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前置因素;相对而言,婚配中受挤压的往往是教育水平较低、地域偏僻、工作条件不好、收入低等自致性因素较差的群体(彭远春,2004;Das Gupta et al.,2010;Gupta et al.,2013;李成华、靳小怡等,2013);同时,个体的社会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社会资本的优劣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台湾1970~2014年和大陆1987~201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运用理论男婴富余比和改进后的婚配性别比法,对台湾婚姻挤压水平和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与大陆1987~2013年理论男婴富余比和婚姻挤压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首先,1970~2014年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呈上升趋势,但都小于10%,台湾不同出生队列的理论男婴富余的规模数不大;1970~2014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MR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从轻度的女性婚姻挤压转为男性婚姻挤压。其次,1987~2013年,台湾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小于大陆,但这期间的婚配性别比MR值,台湾地区的值都高于大陆。这可能是由于出生性别比是影响理论男婴富余比的主要原因,而大陆的出生性别比几乎都高于台湾地区,所以测算出的大陆理论男婴富余比高于台湾。同时,大陆婚龄期人口规模数比台湾的大,当婚姻市场出现婚配失衡的情况,表现出的婚姻挤压度则不是很急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稀释效应”;大陆1987~2013年婚配性别比MR值在100的周围波动且波动区间略大,婚姻挤压度呈波浪状的上升趋势,上升了0.26个百分点。最后,利用中国台湾和大陆历年的出生性别比数据,检验宏观的人口因素对未来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影响。发现婚姻市场中适婚男女的婚配是受个体主观偏好和客观的婚姻市场结构二者共同作用。宏观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前置因素,个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经济基础、工作情况等要素导致的主观偏好才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尽管台湾地区和大陆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程度也渐增。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可能导致对婚姻挤压度的高估。其一,本文选取的婚配性别比法将夫妇婚龄差限定在-1~4岁之间,而现实生活中夫妇婚龄差呈现拉大的趋势,不会局限在上述6个年龄别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婚姻挤压水平。其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婚年龄会有所提高。因此,本文选择的婚配性别比法中,对最高婚姻值的限定可能偏低,会引起婚姻挤压的测算误差。其三,利用理论男婴富余比法对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的估计,忽视了男女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死亡水平,分析台湾地区历年的人口死亡率和大陆“六普”数据得知,人口的分年龄别死亡

率呈现“U”型变化趋势且男性在各个年龄别上都高于女性,而高估了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度。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提高生育率是解决婚姻挤压的宏观前置条件之一。大陆已经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二孩,台湾也为应对少子化,提出重建家庭价值、提供生育津贴以及改善产假等措施,鼓励生育,这将有利于缓解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学界及实践部门普遍都认为提高生育率、控制出生性别比似乎就能应对未来婚姻挤压的挑战,而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不够全面。因为,宏观的人口数量及结构只是婚姻挤压的前置背景,导致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主观偏好。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婚姻挤压的问题,应致力于改善相关导致适婚者主观偏好变化的各种要素,诸如收入水平、阶层及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价值取向、乡村及贫困地区与城镇发达地区的统筹协调发展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Gupta M. D., Ebenstein A. and Sharygin E. J. 2010. China's Marriage Market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for Elderly Men.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5351: 1-37.
- 2 Freedman R., Chang M. C. and Sun T. H. 1994. Taiwan's Transition from High Fertility to Below-replacement Level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5: 317-331.
- 3 Goodkind D. M. 1991. Creating New Trad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iming for Birth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7: 663-686.
- 4 Gupta M. D., Ebenstein A. and Sharygin E. J. 2013. Implications of China's Future Bride Shortage fo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Needs of Never-married Men. Population Studies 67: 39-59.
- 5 Zhang H. 2009. Labor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Rise of Neo-Local Marriages in the Economic Boomtown of Dongguan, Sou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639-656.
- 6 Rohlf C., Reed A. and Yamada H. 2010. Causal Effects of Sex Preference on Sex-blind and Sex-selective Child Avoidance and Substitution across Birth Year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Year of the Fire Hors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2: 82-95.
- 7 Goodkind D. 2006.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Historical Legacies, Surprising Findings.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2006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Los Angeles, March 30-April.
- 8 Guilmoto C.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 ~ 2100. Demography 49: 77-100.
- 9 陈友华. 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Chen Youhua. 2004.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European Union Marriage Market.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10 曹萌, 雷鹏, 吴擢春. 中国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地域差异. 中国卫生统计, 2013; 2: 162-167  
Cao Meng, Lei Peng and Wu Zhuochun. 2013. Gender Difference of Infant Mortality and its Disparity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Statistics 2: 162-167.
- 11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8 ~ 2014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Divisio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From 1988 to 2014. China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12 郭志刚, 邓国胜. 年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2: 1-8  
Guo Zhigang and Deng Guosheng. 1998. The Influence of Age Structure Fluctuation on the Marriage Market.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 1-8.
- 13 郭志刚, 邓国胜. 中国婚姻拥挤研究.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0; 3: 1-17  
Guo Zhigang and Deng Guosheng. 2000. Study on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Market and Demographic Analysis 3: 1-17.
- 14 顾宝昌, 许毅. 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 中国人口科学, 1994; 4: 41-49

- Guo Baochang and Xu Yi. 1994.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Chinese Sex Ratio at Birth.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4: 41-49.
- 15 姜全保 李晓敏, Marcus W. Feldman. 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5: 60-68  
Jiang Quanbao, Li Xiaomin and Marcus W. Feldman. 2013. A Study on China's Marriage Squeez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60-68.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 2014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From 1997 to 2014.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17 李南. 高出生性别比及其婚姻后果. *中国人口科学* 1995; 1: 16-20  
Li Nan. 1995.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and Marital Consequence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1: 16-20.
- 18 李树茁. 性别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策略. 探索与争鸣, 2013; 5: 22-23  
Li Shuzhuo. 2013. Gender Imbalance, Male Marriage Squeeze and Marriage Strategy.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5: 22-23.
- 19 李婷 张闫龙. 出生队列效应下老年人健康指标的生长曲线及其城乡差异. *人口研究*, 2014; 2: 18-35  
Li Ting and Zhang Yanlong. 2014. Growth Curve Trajectories of Elderly People's Health Indicators in China: Cohort Variations and Rural-urban Disparities. *Population Research* 2: 18-35.
- 20 李银河. 当代中国人的择偶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 1989; 4: 61-74  
Li Yinhe. 1989. Modern Chinese Standard of Choosing Spous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61-74.
- 21 李伯华 段纪宪. 对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估计. *人口与经济* 1986; 4: 19-23  
Li Bohua and Duan Jixian. 1986. Estimates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4: 19-23.
- 22 李成华, 靳小怡, 井文. “娶妻难”对农村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3: 119-128  
Li Chenghua, Jin Xiaoyi and Jing Wen. 2013. Marit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Rural Area with Regard to Men's Difficulties in Getting Married.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 119-128.
- 23 李树茁, 韦艳, 姜全保. 中国的女孩生存: 历史、现状和展望.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1: 2-16  
Li Shuzhuo, Wei Yan and Jiang Quanbao. 2006. Girl Child Survival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 *Market & Demographic Analysis* 1: 2-16.
- 24 李树茁, M. W. 费尔德曼. 中国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水平、趋势与变化. *中国人口科学* 1996; 1: 7-21  
Li Shuzhuo and M. W. Feldman. 1996. Levels, Trends and Changes 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ese Infant Mortality.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1: 7-21.
- 25 刘爽. 台湾人口婚姻: 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人口研究*, 2000; 4: 61-67  
Liu Shuang. 2000. Marriage in Taiwan: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A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Mainland. *Population Research* 4: 61-67.
- 26 牛艳军, 韩静. 多因素作用下分年龄组的婚姻挤压.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4: 31-35  
Niu Yanjun and Han Jing. 2009. Marriage Squeeze by Age Group Under Multiple Factors. *Journal of Nanjing College for Population Programme Management* 4: 31-35.
- 27 潘金洪. 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人口学刊* 2007; 2: 20-25  
Pan Jinhong. 2007. The Further Imbalanced Gender Ratio at Birth and the Male Marriage Squeeze of China in Future. *Population Journal* 2: 20-25.
- 28 彭远春. 贫困地区大龄青年婚姻失配现象探析. *青年探索*, 2004; 6: 18-20  
Peng Yuanchun. 2004. A Marriage Mismatch Phenomenon of Poor Area Youth. *Youth Studies* 6: 18-20.
- 29 《人口研究》编辑部. 透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人口研究*, 2003; 5: 38-52  
Editorial Board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3.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Population Research* 5: 38-52.
- 30 石人炳. 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后果及其特点——来自对台湾人口的观察. *人口研究*, 2002; 2: 57-60  
Shi Renbing. 2002. Social Consequences of Sex Ratio Imbalan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 Observation of the Taiwanese Popul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2: 57-60.
- 31 孙炜红, 谭远发. 1989 ~ 2030 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青年研究*, 2015; 5: 78-84

- Sun Weihong and Tan Yuanfa. 2015. The Study on Marriage Squeeze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1989 to 2030. *Youth Studies* 5: 78-84.
- 32 王金营, 戈艳霞.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 *人口研究*, 2013; 1: 22-33  
Wang Jinying and Ge Yanxia. 2013. Assessment of 2010 Census Data Quality and Past Population Changes. *Population Research* 1: 22-33.
- 33 巫丽雪, 蔡瑞明. 跨越族群的藩篱: 从机会供给观点分析台湾的族群通婚. *人口学刊(台湾)*, 2006; 32: 1-41  
Wu Lixue and Cai Ruiming. 2006. Crossing the Boundary of Ethnicity: An Analysis of Ethnic Inter-marriage in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Taiwan)* 32: 1-41.
- 34 韦艳, 董硕, 姜全保. 中国初婚模式变迁——基于婚姻表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13; 2: 21-28  
Wei Yan, Dong Shou and Jiang Quanbao. 201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irst Marriage Pattern: Analysis on Nuptiality Tabl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 21-28.
- 35 杨文山. 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机遇与挑战——21 世纪两岸四地的人口变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Yang Wenshan. 2005. Marriage Squeeze in Taiwa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Macau, Taiwan and the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36 于宗先, 王金利. 台湾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 台湾: 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9  
Yu Zongxian and Wang Jinli. 2009.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37 张荣富. 年龄对择偶年龄与身高偏好门槛的影响. *中华心理月刊(台湾)*, 2006; 48: 275-289  
Zhang Rongfu. 2006. Aging Effect on Mating Preference Thresholds of Age and Height.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Taiwan)* 48: 275-289.
- 38 张荣富. 适婚人口性比例对择偶年龄偏好的影响: 以台湾与日本大学学历者为样本. *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台湾)*, 2010; 2: 1-11  
Zhang Rongfu. 2010. The Effect of Marriageable Sex Ratio on the Age Preference of Mate Selec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Highly Educated Taiwanese and 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aiwan)* 2: 1-11.
- 39 张荣富, 蔡滋纹. 学历“挤压困境”: 择偶网站资料的分析.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台湾)*, 2014; 1: 205-263  
Zhang Rongfu and Cai Ziwen. 2014. The Predicament of “Education Squeeze”: An Analysis Using Online Dating Dat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Taiwan)* 1: 205-263.
- 40 张荣富, 唐玉婵. 逐岁分析男女年龄对择偶偏好的影响. *淡江人文社会学刊(台湾)*, 2009a; 40: 115-144  
Zhang Rongfu and Tang Yuchan. 2009a. Age Effect on the Age Thresholds of Mate Selection by Each Age. *Tamka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aiwan)* 40: 115-144.
- 41 张荣富, 唐玉婵. 个人结婚年龄与配偶年龄差距的关系. *教育与社会研究(台湾)*, 2009b; 19: 111-131  
Zhang Rongfu and Tang Yuchan. 2009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Marriage Age and Spouse Age Difference. *Education and Social Research(Taiwan)* 19: 111-131.
- 42 郑维东, 任强. 中国婚姻挤压的现状与未来. *人口学刊*, 1997; 5: 37-45  
Zheng Weidong and Ren Qiang. 1997. Present and Future of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Population Journal* 5: 37-45.

(责任编辑: 石玲 收稿时间: 2016-01)